

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、南京及苏浙皖三省后,扶植了梁鸿志、温宗尧等汉奸组成的“维新政府”,由于这个傀儡政权主要由北京政府的失意政客官僚组成,号召力不强,于是日本侵略者又看上了主动“投怀送抱”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,支持他组织与重庆唱对台戏的“国民政府”。

汪伪政权为何设在鸡鸣寺



1940年3月30日,汪精卫带领汉奸们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鸡鸣寺举行“还都”典礼,宣誓就职。“还都政府”不能回原国民政府,只能在原考试院内,这又是何原因呢?

其实汪精卫不是不愿搬进原国民政府,虽然汪、蒋明争暗斗多年,总统府

大院不仅是蒋介石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办公地,更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的所在地。从法理上说,都是国民党最“合适”的政权所在地。汪精卫多次向日本人提出,要搬至原国民政府办公,但是日本人以多种理由一拖再拖。

日本政府内部对汪伪政权的态度也不统一,华中、华北均不容汪精卫染指。于是汪精卫别出心裁地宣布“国民政府”主席仍是身在重庆的林森,自己只是代理主席。而林森本人拒绝日本诱降,断然表示不会做汉奸。日本人心里很清楚,重庆的国民政府才是“正宗”,南京汪精卫的“国民政府”只是权宜之计。日本人诱降拉拢蒋介石、林森失败后并未死心,还在不断地想各种办法,自然不会

轻易让汪精卫进驻原国民政府。

那些老资格汉奸也不肯放弃既得利益。比如梁鸿志之流,对汪精卫要在原国民政府办公也表示不满:你汪精卫算老几,我投身“和运”时,你汪某人还在重庆唱抗日高调呢!凭什么要我把国府让你!

梁鸿志的维新政府“完成使命”后解散,梁鸿志在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任监察院长,办公地点依然在原国民政府内的老地方,连办公桌都未挪。后来又在原国民政府内设立了立法院、考试院。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,依旧只能设置在距离不远的鸡鸣寺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内,直到抗战胜利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日军漫画记录 中国英勇抗日



斋藤邦雄原是日军第63师团(代号“阵部队”)机枪射手,1941年入伍,曾在华北与八路军为主的中国抗日力量作战多年,后转入东北关东军序列,战争结束时被苏军缴械。战后回到日本的斋藤写下了多部著作,描述在军队所经历的种种情形。其中,《陆军步兵漫话物语》一书,既描述了中国军民机智英勇的抵抗,又辛辣地表现了日军中的残暴愚蠢、内部欺压等现象,并配有斋藤自画的漫画插图,在日本销量达40万册,影响很大。

这么一个“老”日本兵,同时还和八路军打了三四年的仗,堪称苦大仇深,怎么会写出如此自嘲而又辛辣的作品呢?大体原因有三:第一,斋藤当兵纯属被迫。他原本是东宝电影公司的职员,整天接触的都是莺莺燕燕、哥哥妹妹,这种“萎靡之徒”对战争可谓毫无兴趣。为了逃避兵役他曾喝过一年多的酱油(据说这样体检会不合格),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去。第二,在斋藤当兵期间,八路军组织的日本反战同盟曾多次到斋藤的据点进行宣传活动,甚至把宣传品混进日军的慰问品中,这些与日方宣传口径完全不同的材料使斋藤深受影响。第三,因为文化程度高,斋藤曾被调到旅团情报室,负责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。这下子可热闹了——他整天读《实践论》、《论持久战》和八路军的国际形势分析,斋藤竟然是越看越觉得有道理。

在日本陆军情报室的“帮助”下,这位被“洗脑”的斋藤后来甚至做出过私放八路军侦察员的事情。(据新华网)

何应钦为拉票放跑日军



1945年4月,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时刻,在雪峰山战役中,国民党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率部回到了湘西老家作战,拿出王牌军的威风,挥师一路猛进,席卷敌阵。杨部以一个团的兵力,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,攻占湘黔公路要点——石下江镇,完全截断日军后方的交通线,形成对日军四面包围的态势。各

路人马不顾疲劳,奋勇直前,咬住日军,毫不放松。包围圈越来越紧缩,日军喊爹喊娘都没有用,陷入绝境之中。

正在这时,11师师部忽然接到军长胡璉转来的上级命令:“将扼守在石下江镇的这个团全部撤离,集中全力,向敌侧面攻击。”看到这个命令,杨伯涛简直惊呆了,立即摇通军长的电话,大声嚷着:“老胡,这样咋行?你这样一个命令,我的包围网就会开一个大口子,被围日军就会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啊。”

“没有办法,我也这样说过,上峰就是不听,执行命令吧。”胡璉军长说完,撂下话筒。

这个团一撤离,口子放开,被包围的日军,果然呼啸而去,杨伯涛虽然督队追击,却斩获不大。随后,各军在全线乘胜追击恢复所有失地,回到会战前态势,湘西雪峰山会战这样结束了。

日军势穷力竭,陷于重围。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全歼被围日军,上峰怎么突然命令放开口子?原来,问题出在这次会战的总指挥、陆军司令何应钦身上。

当时,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

会正在重庆举行,与会人员对湘西战事十分关注。这让何应钦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,自己挂名会战总指挥,所有的功绩和光环,全落在自己的身上;紧张的是,要彻底拿下鬼子,进行围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何应钦生怕战事拖延,影响“六大”的气氛,决定再掀起一个胜利高潮,乘势将自己的选票拉上去。他仔细一想,一旦发起总攻,到时能不能速战速决?万一哪个环节出错,一切都将前功尽弃,到手的胜利又飞了,自己马上就会受到代表们的指责。踌躇再三,何应钦想出一个“取胜的捷径”。放开石下江“锁匙”,把围住的日军放出去。这样一来,提早结束会战,给“六大”一个“满意的全胜的答复”,自己也可以获得高额选票。因此,他强令杨伯涛在前方开口子,放鬼子跑。

被围住的日军全跑掉了,在重庆的“六大”代表们,并不知情,他们只知道雪峰山会战胜利,把鬼子打跑了,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何应钦也人气井喷,得票飙升。

(据《石家庄日报》)

抗战期间朝日华侨的艰难抉择

抗战期间,许多侨民居住在敌对国的领土或殖民地,他们该如何自处?

卢沟桥事变后,滞留朝鲜的华侨不得不谋求与日本的和睦。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被迫二选一的情况下,汉城总领事范汉生因南京陷落,选择了支持华北伪临时政府(1937年12月成立)。以汉城、仁川为首的朝鲜所有领事馆和普通华侨都陆续转变态度,支持伪临时政府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呼吁日本各地的领事馆支持华北伪临时政府。

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的成立,以及日本对它的承认,对华侨来说鼓舞人心。因为它意味着华侨从“敌国”国民变成了“友邦国民”。所以

朝鲜各地以总领事馆为首,纷纷召开庆祝大会,并派代表去南京参加庆祝大会。部分华侨赞同“反共和建国”“东亚新秩序”的主张,还积极为国防捐款、殖民掠夺性的“献金运动”奔走。

随着战事的发展,华侨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矛盾扩大。朝鲜华侨开始一边尝试外交斡旋,一边进行暴力抗争。1941年后,日本当局以间谍为名肆意抓捕侨民,并且严刑拷打、捏造罪名。部分朝鲜华侨加入八路军,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,并在搜集粮食等经济情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。

在日本方面,抗日战争爆发后,滞留日本的华侨有大约2万人。迫于

形势,他们不得不同国民政府划清界限,转而依附伪政权。不仅如此,一些华侨还冲击中国大使馆,要求将使馆移交华北伪政府驻日办事处。

汪伪政府成立后,日本一些侨团组织了庆祝活动,侨民接受汪伪政权于1941年设立的大使馆的保护。战争后期,随着日本侵略战争形势的江河日下,日本政府实行更加严格的战时物资管制政策,华侨的生产、生活陷入困窘。不仅如此,华侨还受到侨案、献金运动、“勤劳服务运动”等配合日本侵华战争的运动的冲击。他们被迫献金给南京伪政府和日本政府,给日本政府做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。(据《东方早报》)

茅以升:不复原桥不丈夫



1937年12月23日,日军进逼杭州。桥梁专家茅以升无奈指挥炸掉了由其亲自设计的钱塘江大桥。两天后,茅以升离开杭州。临别,作组诗,其中一首是:“斗地风云今变色,炸桥挥泪断通途;五行缺火真来火,不复原桥不丈夫。”

(据《老年生活报》)